

耳顺六记

陈思和◎著

ER
SHUN
'LIU
JI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耳顺六记

陈思和◎著

ER
SHUN
LIU
JI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耳顺六记 / 陈思和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222-13843-8

I. ①耳… II. ①陈… III. ①陈思和 - 文集 IV.

①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6145号

责任编辑: 周明全 苏映华 刘 焰

装帧设计: 马 滨

责任校对: 徐 霞

责任印制: 洪中丽

耳顺六记

陈思和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3

字数 340千

版次 201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中国石化集团滇黔桂石油勘探局昆明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222-13843-8

定价 43.00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 0871-64191534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CONTENTS

耳 顺 六 记

目 录

第一辑 师长记恩

P1

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	(3)
思念一年	(25)
五年来的思念	(28)
我的老师们	(35)
章培恒先生	(44)
山田敬三《小说家与鲁迅》讲评	(52)
曾华鹏先生与现代作家论	(57)
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您怎么就走了？ ——告别潘旭澜先生	(62)
怀念李子云老师	(67)
我心中的巴金先生	(73)

第二辑 往事记怀

P83

沈谦先生	(85)
想念秀丽	(88)
耀德不见了，文学衰落了	(93)
曾敏之先生	(100)
回忆胡河清	(104)
假如中国现代小说也有“大传统” ——纪念夏志清先生	(106)
怀念程乃珊	(113)
一段回忆	(117)
杭州会议与寻根文学	(120)
三十年前的一本书	(126)

第三辑 读书记览 P131

现代人的失忆症说明了什么？	(133)
王安忆笔下变化中的上海	(138)
寻求岩层地下的精神力量	(142)
倾听八十年代的“绝响”	(150)
读这样一部书	(158)
当代文学中的记忆创伤	(162)
阅读《惘然记》的几段札记	(171)
读吴基民的《炼狱》	(181)
正在“死着”的灵魂能够想到些什么？	(185)
林幸谦诗文创作随想	(188)

第四辑 艺文记趣 P193

论鲁妈：一种被遮蔽的性格	(195)
塑造当代“脊梁”的艺术形象 ——奚美娟电影表演艺术欣赏	(199)
电视剧创作的两个传统	(210)
关于改编动画《白驹》的意见	(215)
关于《一只被依附了人类灵魂的猫》的若干 思考	(218)
试谈当代戏曲的文学史意义	(223)
请循其本 上下求索 ——孙晓云的书法理论探索	(227)
关于鲁迅、里维拉和弗里达	(232)
记忆中的张瑞芳	(237)
美食家焦桐	(240)

第五辑 序跋纪要 P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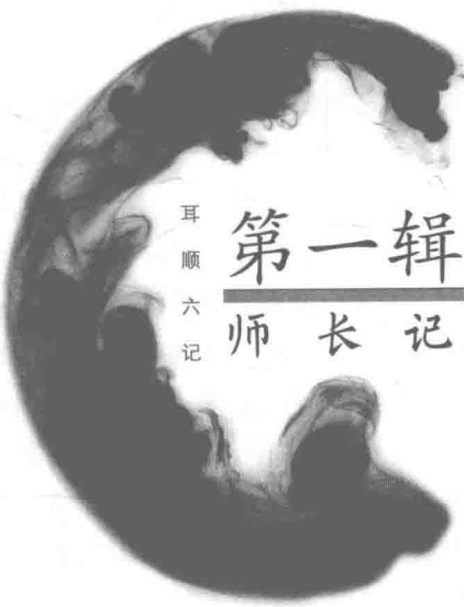
《从鲁迅到巴金——陈思和人文学术演讲录》 序	(247)
《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陈思和卷》序	(251)
《文学史理论的新探索》序	(261)

《巴金晚年思想研究论稿》后记	(265)
《中国现代文论选》序	(268)
《史料与阐释》卷头语（三则）	(271)
“文学探索丛书”序	(277)
《新世纪小说大系》总序	(280)
“‘80后’批评家文丛”序	(285)
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而写	(289)

第六辑 会议记言 P293

学习巴金，做一个有理想的人	(295)
巴金研究的困难与展望	(297)
关键在于要有宽阔的胸襟与视界	(306)
学院·学院派·学院批评	(310)
对中国文学外译的几点看法	(320)
关于大学的文学教育	(329)
赞词：阎连科的艺术世界	(335)
财富·精神略谈	(338)
人文精神讨论再出发	(342)
林建法与他的编辑生涯	(349)

后 记	(354)
-----------	-------



耳
顺
六
记

第一辑

师长记恩

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

一个多月来，不少在媒体工作的朋友来约我写纪念贾植芳先生的文章，我都答应了，却迟迟地写不了一个字。头脑从未有过的迟钝，思绪从未有过的滞涩，我都尝到了。直到今天，谢天振教授在光华楼主持了先生的追思会。我在场内突然明白过来，我的无意识里，何尝不是暗暗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先生真的离我而去了。

一个多月来，我昏天黑地地忙碌，差不多一直在外地跑来跑去，用紧张的工作去麻醉自己，努力不去碰这样一个事实。我希望先生还坐在他的书房会客、读书，写他的日记，发出他的朗朗笑声。先生高龄却无大病，性格豁达，看淡生死，晚年他的生活平静而幸福。他生前最后几个月一直住在第一人民医院的特需病房，享受着医院里一流的照顾。医生告诉我先生睡在病床上，伸手碰得到的地方全是书，始终关心着医院外发生的事情。十天前医生发现他有心脏停搏的迹象，中文系马上送去了费用为他安装起搏器，那天，去医院探望的是副系主任祝克懿老师，回来告诉我，先生的笑声响彻病房。当时我想，先生是老年人，身体内各种器官都趋向衰弱，并没有致命的病，即便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约也还可以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对于先生那样坚强的生命，任何奇迹都是可能出现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仅十天以后，先生的肠道、呼吸都出了问题，突然间的，撒手离开了这个世界。

先生真的离我而去了。校园里挂满了学生亲手叠的白纸鹤。我走在那些白纸鹤行列中，突然想起了先生曾经告诉我的一件事：1966年五六

月间，先生作为胡风冤案的“骨干分子”服刑后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被安排在复旦大学的印刷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一个很热的中午，先生赤裸上身，拖着一辆沉重的拖车，从学校的工会礼堂前走过。正巧礼堂门口站着一群中文系的老教授，他们衣冠楚楚，从里面走出来，说说笑笑，不曾注意迎面走来的一个拖车夫。先生是远远地看见他们了，他们曾经是同事、是朋友，可是在195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是他出狱后第一次以这种难堪的方式与他们劈面相对。先生说，当时他想回避，拖着车子绕开走，可是他的脚还是一直往前走着，终于走到了这群过去的朋友的面前。他们都怔住了，禁了口，惊恐地看着狼狈不堪的先生。先生说他还是抬起了头颅，默默地在同事们不同的眼神下走了过去。他心里在念叨，你们也许比我还要狼狈了。果然，不久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所有的教授都在劫难逃了。

我想说的是，先生做人的坦荡。这是我从先生身上最强烈地感受到的一种品质。我们今天常常劝人走好一生的路，用“清清白白做人”来勉励自己或者别人，但我觉得，做个坦坦荡荡的人，比做个清清白白的人，更加坚强和不容易。清清白白，可以从消极的立场上去拒绝和抵制这个社会的污浊；而坦坦荡荡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人，他就是一脚踏进了污泥浊水，他还是能够坦坦荡荡，哪怕他坐在监狱里，受千百人的唾骂、侮辱、迫害，他仍然是个仰俯无愧的人。先生一生的命运总是与国家命运的多难联系在一起。抗战爆发，先生在日本大学攻读社会学，为了抗战，毅然决然放弃了学位奔回祖国，在枪林弹雨的中条山战区出生入死；他的伯父身为买办，膝下无子却广有家产，曾经对先生说，你一生奔波，几次入狱，还不如随我做买卖，继承家业。先生却对伯父说：您出钱供我读书，不就是想让我活得像个人样吗？如果你让我去做个商人，何必要我苦苦读书呢？先生拒绝了商人伯父的规劝，结果因为支持复旦大学进步学生运动而再度入狱。1955年，他的朋友胡风等人被诬陷成反革命集团，先生又一次为朋友的牵连蒙受25年的不白之冤。今天，一个崇尚金钱万能的人很难想象，像先生那样一个人，一次次拒绝了命运本来给他安排好的外国名校文凭学历、万贯家产、高级白领、红色教授的道路，却投身到战场、监狱、运动……当然这不是他的有意选择，但是作为一

个坦坦荡荡的人，在为国家尽忠诚、为知识分子寻理想、为朋友担道义等大节上，他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感到奇怪的是，有过这样命运的老人，却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流露出苦难笼罩在他心里的阴影。我不是说先生的心灵深处没有这些苦难的阴影，但是他从未因为受了那些苦难而改变对生活的热情和善意，比如说，对人的信任和热情。先生这种性格特点在经历过苦难的老一代人中是很少见的。我们中文系有一位老教授，也是极有声望的老知识分子，性格非常豪放，他与先生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畅怀大笑，但是一旦有年轻人走近，他马上就闭口不言，匆匆而辞。先生告诉我，那位老人以前在政治运动中吃过年轻人的亏，从此就不再信任年轻人，后来连研究生也不再招收。我想这位老人的心灵一定是很寂寞的。而先生不是这样，他对人的信任有口皆碑。我遇到过一件事：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先生去苏州大学开会，会上有位来自广西的大学教师，回广西途中需在上海中转，他想在上海住几天，有人就介绍他可以住在先生家里，并且给先生做了说明。可是那次外出师母没有陪同，先生耳背，没有听清楚是怎么回事，还以为那位教师是苏大安排送他回上海的工作人员。就这样，那位教师心安理得地在先生家里住了三天，先生也每天好烟好酒地招待，三天以后客人回了广西，他才疑疑惑惑地问我：那位客人是什么人？为什么在他家里住那么久？这时候我才发现，先生根本连客人的名字、身份、缘由完全都不知道。这种事情在俗人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对于一个坦诚君子来说，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先生常常喜欢说一句江湖话：出门靠朋友。他说他十几岁离开家，在社会上闯荡大半辈子，靠的全是朋友的情谊和帮助，尽管“朋友”这层关系也给他带来了灾难，但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朋友来承担的。先生对“朋友”这个称呼极为看重，如果谁被他称为“我的朋友”，那就意味着他将与你肝胆相照、赤诚以待。

正因为先生是个坦荡的人，所以他能够通达地放得开自己所经受的苦难，放得开一生所经历的大小恩怨故事，顾全大局，胸怀大的目标，从来不会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名利、面子、档次等一般文人最喜欢纠缠的小节上计较是非。我听说过一件事，先生陪几位外宾去某地参加一个活



动，开饭时，当地主办单位的领导临时赶到，听说有外宾出席（20世纪80年代外宾出席还是很少见的），就立刻安排另席招待，匆匆把几位外宾请走了。因为那位领导不认识先生，就没有顺手邀请，旁人可能感到有些难堪，先生却一点也不在乎，依然说说笑笑。一会儿，那位领导又匆匆赶来，原来他听说了先生在场，连忙赶来道歉，再请先生也过去用餐。照一般人想，先生也许会生气，拒绝参加，其实先生毫不介意，照样开开心心地出席用餐了。那位领导才松了一口气。事后，先生从未与我说起这件事，倒是那位领导有一次感动地向我诉说了先生的高尚人品。我觉得，这就是先生的坦荡之处，他从来没有摆出老人的尊严，所以他精神始终年轻；他从来没有摆出名流的架子，所以他的朋友遍天下；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曾经受过的苦难当作一种资本愤世嫉俗，所以他笑口常开，仁者长寿。

先生这样的通达为人，绝不是乡愿处世的态度，经历过如此大风大浪的人，他对于世态看得非常清楚，只是不该计较的事情他绝不放在心上。我可以说出许多这样的故事。如，他冤案平反不久，恢复了教授的身份，学校有关部门安排他去当图书馆馆长。我本以为先生会拒绝这样乏味的工作。因为听先生说，老校长陈望道曾经公开说过，贾植芳是个“无政府主义”，上午让他当官，晚上就要下台。但没有想到“无政府主义”的先生还是接受了这项工作。我曾经表达了我的意思，先生笑着对我说，上面要落实政策嘛，就让他们落实一下，不要让他们为难了。他就认认真真的在馆长的任上工作了几年，还主持修建了文科图书馆大楼。过了一任，先生已经70岁，学校里通知他要退休了。很多朋友为他抱不平，认为学校这样对待他是不公正的，梅志先生特意来信，劝他在退休前提出离休的待遇，还表示愿意为他写证明。先生也是笑了一笑，对我说，这种“干部档次”，我要它干啥？于是就坦然地按照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退休了。这两件事，看上去好像有相反的含义，但表现了先生对于名利、对于工作、对于个人的道德追求，完全是一以贯之的。先生善解人意，一般也不拒绝社会上对他的好意相助，但并不是没有原则，对于社会上流行的一些特权，他非但不屑于计较，而且有时候会表现出非常的独立性。

记得在几年前师母病重期间，先生每天要把大量的钱花在医药费用上，可能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别人（包括他的学生）说过自己的困难，也从未怨天尤人地抱怨命运不公（后来我忍不住内心的感动才写了《感天动地夫妻情》一文，披露先生当时的困境）。而先生多次与周围的人说过，他是手里拿着几个铜圆、一卷铺盖进入上海的，现在成了有家业、有房产的“有产阶级”了，大不了自己可以再拿几个铜圆卷了铺盖回山西老家去终老。所以我想，当时先生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经济状况，但他宁可准备卖房回老家来挽救师母的生命，也不愿意伸手求助。他的赤诚之心，终于感动了上苍，师母的生命竟奇迹般地延续了整整三年。当最危急的时期过去后，先生又恢复了自信。最近我读了不少有关先生的文章，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潘真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短文《贾植芳先生的一辈子像一堂课》，文章里说：“我曾写过报道《资深望重的贾植芳月入仅二千，一批退休老教授渴望得到善待》。没想到见了面，贾先生竟安慰我，已经加了，他是复旦加得最多的，退休金加到两千元，月收入有三千五百元了。‘任敏（陪他受苦受难一辈子的妻）也走了，不需要花钱了，够了。’”尽管我不认识潘真，但她所写的确确实实是先生说的话。先生的高贵和傲骨，就是这样隐伏在他的坦荡的襟怀里。

先生一生最重视的是知识分子的称号，这是他自觉履行“五四”新文学精神使命的最根本的动力。他所戚戚然的，总是天下的大事，而不是个人的命运。1996年我陪先生去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轮到先生上台做报告时，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尉天骢做讲评，他手里挥舞着先生的传记，高声赞美先生苦难而高贵的人生，全场掌声雷鸣，向先生致敬。先生耳聋听不见尉先生的话，紧张地东顾西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他一走下讲坛，诗人罗门就跑去向他倾诉心里的感动。先生才明白刚才会场里的掌声是怎么回事。他松了口气对罗门说，做个知识分子，总是要像耶稣那样，一代一代背着十字架往前走的。说得非常平常，但又是那样的沉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他才会这样举重若轻地对待人生——这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人生。

二

我已经记不起来，我第一次是怎么与贾植芳先生见面的。但肯定是1978年下半年在中文系资料室。那时中文系设在一个破旧木结构的楼房的二层，资料室设在走廊西端的一间大房间，平时老师们读书、交流、开大会等等，都在那间房里。因为面积不大，看书阅报议论的人多，总是感到有些嘈杂。在那一片声音里，最引人注意的是先生的一口山西腔，总是高亢有力，不断地指点学生，你应该读这本书、应该读那本书。旁边年轻的周春东老师轻轻介绍，这位是贾植芳，著名的“胡风分子”，英文、日文都来赛（来赛，上海方言，了不起）。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胡风分子”这个词，也第一次知道这个词与“地富反坏右”一样，是打入另册的。

当时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还没有平反，但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风已经微微地在吹动，或者说，即使没有思想解放运动，经历了“文革”盛衰的中国老百姓，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早已厌倦了阶级斗争的血腥味。当时的思想风气推动着我们把立场转向“文革”中（也包括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有）的政治受难者，同情他们也赞美他们，所以贾植芳先生戴着“胡风分子”的政治帽子，并没成为我们接近他的障碍。而贾先生似乎也没有顾虑到他的政治身份和学生之间可能发生的麻烦（这些麻烦，在早几年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的时候是十分普遍的）。他与我们的交流就是那么朴素而简单，那么直截了当。我们是怀着神秘的好感去接近他，他也是怀着热烈的情怀来接近我们，二十多年的高度压抑使他满腔的热情、经验、学问，都像火山爆发似的，迫不及待地要喷发出来。这样，我们就成为最幸运的学生，谈话通常是从我们向他请教开始，接着就是听先生滔滔不绝地讲，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引导我们一步步走进了现代文学史的堂奥。

后来我们知道，先生与我们交往其实还是有顾虑的。李辉在一篇文章里说到过，先生那几年的日记里，总是含糊其辞地记载着小陈、小李，而不写我们的名字，他这样做是怕万一有了政治风波会牵连我们。我想

这是先生长期受迫害造成的心理阴影，只是平时被掩盖在豪爽的热情本能之下，我们察觉不出而已。联想到后来又一个政治风波发生，先生直接就对我说，应该把一些会惹麻烦的书信日记都处理掉，他说他自己过去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太多，舍不得随时处理一些不该留下的东西，才会在复杂的政治纠葛中一次次地罹祸。“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能活下来说说说话就不容易，书信文稿什么都是不重要的。”他亲口这样对我说。由于那次风波过程本身一波三折，呈现出复杂的局面，有许多人起先纷纷激烈表态支持学生运动，唯恐自己的名字不被人注意，后来风向逆转，又慌了手脚，做了一些为人所诟的事情。学校里一时议论纷纷，月旦四起，先生始终冷眼看着局势，有一句话他在风波之前之后说过多次，至今还有人在流传。他说，武松打虎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打死老虎，做英雄；还有一种是被老虎吃掉。你是武松就去打老虎，是武大郎就去卖烧饼。武大郎不能看武松很光彩也跟着去凑热闹打虎，只想做英雄不准备被老虎吃掉，那是不行的。

由于现实的教训，晚年先生心底所埋藏的阴影有时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起着作用，左右着他的一些念头，使他对于身边发生的政治动荡不再有年轻人似的盲目和冲动，他对于政治的多变性与复杂性已经有太多的经验。在他自己与客体世界的互动关系上，他是有足够的清醒认识。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种对自由的理想、对友谊的信任以及知识分子之间的相濡以沫的感情，却始终荡漾着，就像年轻人一样的热烈。譬如他对胡风及其他受难者，一直怀着难以抑制的热情。1985年8月6日，在胡风去世后两个月，胡风家属决定办理遗体火化，不开追悼会，也不举行告别仪式。贾植芳、王戎先生从上海赶到北京，与在北京的朋友一起向胡风做最后告别。记者李辉在场，细腻地记下了这个时刻的贾植芳。

紧接着周颖之后的是贾植芳，年过古稀的他，一跨进门槛，就号啕大哭。所有人中，只有他如此不能自制，哭得那样伤心。他的声音很粗，“哇”的一声哭叫，一下子使气氛变得更为压抑。他哭得时间很长，站在胡风的遗体面前，嘴里不时叫一声“老胡”，他好久也不愿离开。没有人来劝他，没有人来拉他，任他放情地恸



哭。他一边哭，一边朝梅志走去，梅志平静依旧。

与别的在场的人的冷静相比，贾先生的感情喷发出乎我的意料。我在先生身边三十年，没有见过先生用这样的方式放任自己的悲痛，连在师母的告别仪式上也不曾见到。但我毫不犹豫地相信，先生面对他患难与共的朋友胡风的遗体，他会这样表达自己。就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狱里狱外》所写的法院宣读判决的场景。

宣判会开始了，先是检察员念起诉书。当他念到“首犯胡风，1965年11月26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该犯已认罪服法”时，我在紧张的状态下，把“服法”听成了“伏法”，脑子里猛地飘过一个念头：怪不得上次在监狱里，那人说不会枪毙我，难道胡风被枪毙了？这么一想，我脑子轰的一下昏起来，眼泪顿时模糊了一切。那个检察员还在振振有词，但似乎离得很远，我根本听不见了，我不知道起诉书和判决书的内容是什么。

这就是贾先生的性格。在自己性命攸关的时刻，他误以为胡风已经被害，悲恸之情使他听不见自己的判决书。这都是他的热情本能战胜了残酷政治斗争强加给他的心理阴影，露出了他的率真性格的地方。

在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中，除了瘐死狱中的阿垅，贾先生不仅是被判得最重，而且是冤案解决最迟的。在1980年胡风冤案初次平反的文件上，别人都摘了帽子，唯独对贾先生还留了个尾巴，就好像全国“反右运动”最后还留下了五个人垫底一样，又过了两年才最后解决。对这件事我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对于整个胡风冤案中贾先生的遭遇也有许多不解之处：首先，贾先生并不是文坛纠纷的中心人物，他因投稿结识胡风，把胡风视为引路人和朋友，但他不关心也不擅长胡风的那套文艺理论，不像阿垅、路翎那样，一开始就陷入是非的中心；其二，贾先生是一个三教九流都交往的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宗派性，比如，他与当年鲁迅的对手施蛰存、韩侍桁、邵洵美都有很好的交往，又因为他的哥哥贾芝先生在延安方面有特殊的背景，多少也应该有些保护作用，

不至于成为胡风集团里的铁杆分子，也不至于受到这么寝皮食肉的仇恨和迫害；其三，我一直觉得，贾先生的思想谱系和社会经验，与胡风一派的主流思想有些距离，他是胡风一派朋友中的一个另类。1950年以后，胡风身陷北京屡战屡败，先是文艺理论受到批判，他就发表长诗《时间开始了》，热情歌颂新政权，企图以诗歌的成功来证明其文艺理论的正确；后来诗歌也受到压制，他就铤而走险写了“三十万言书”，企图通过告御状来制服他的对手，结果都失败了。贾先生实心实意地劝胡风：“我们都不如鲁迅先生，鲁迅在二三十年代卷入政治漩涡，但他深深懂得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他进得去出得来，始终有主动。而我们不行。你不懂政治却偏偏往政治旋涡里凑，那是太危险了。”他劝胡风放弃文艺思想争论，埋头翻译阿拉伯神话《一千零一夜》。这当然不是胡风所愿意接受的，贾先生对危险充满警觉，胡风却不以为然，结果还是携手走进了一场大灾难之中。

如此归纳起来，一、先生不是文坛纠纷的中心人物，二、有贾芝为背景，三、他对政治斗争有相当高的敏感。凭着这三点，先生就不应该成为胡风冤案里最受累的“分子”。然而他却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想这灾难发生之前，胡风的手们一定拉拢过贾先生，如果堡垒要从内部攻破的话，第一个缺口就应该从贾先生身上打开，而不是身处边缘地带、已经有辫子抓在对方手里的舒芜。进一步也可以这样理解，贾植芳先生所拒绝的，也许正是舒芜求之不得的机会。《狱里狱外》里有“京上阴云”一节，先生回忆了当年何其芳通过贾芝找他谈话的事，似乎是含有要他反戈一击的意思。我后来就这个猜想请教过先生，先生默然。他却说了另一件事，说1979年他还没有完全平反，去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参加一个现代文学资料丛书的编辑会议，轮到讨论“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的主题时，主持方安排先生主持会议。先生一言不发，只是让与会者自由讨论，什么态度也不发表。这是先生告诉我的原话，但从先生的语气里可以感受，他对此事的理解是很情绪化的，他认为主持方是有意考察他对胡风冤案的看法，但先生不表态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态度。接着贾先生转述了李何林先生对他说的话，说是：“你怎么跑到周扬一帮去开会了？”这种怀疑色彩就更加明确了。所以先生的结论是：